

## 俄羅斯人眼中的車臣人：文化差異與政治學

◎ 侯艾君

有人說，車臣的文化是那種很難被現代化的文化，其內在要求是竭力保持傳統。在車臣乃至整個北高加索地區，其文化的特點在於：信仰伊斯蘭教，男權優先，注重親緣聯繫，村社生活，崇拜長老，等等；而且，許多個世紀過去了，而車臣乃至整個北高加索地區的社會狀況的發展和變化卻相當緩慢和不那麼顯著。當車臣危機使車臣民族從幕後走向前臺、從邊緣走向焦點和核心的時候，車臣人乃至整個北高加索地區的人民依舊保持了自己許多個世代以來的社會組織、生活方式、價值觀念。看過那些對於車臣民族、車臣社會的研究著作或者採訪報道，讓人覺得，車臣的人民似乎仍舊是19世紀沙米爾時代的人民。對於車臣乃至整個北高加索地區的社會文化發展來說，地理因素是一個極為重要的因素。而整個北高加索地區由於地處山區乃至高山區，道路不通，與外界交往比較少，具有相對於外界的封閉性；除了地理因素以外，也由於北高加索地區的宗教、和部落組織結構和體制——在車臣、印古什、達吉斯坦、圖忽米等地都存在著泰普（Тейп，相當於部落或部族）體制。這些因素不僅影響到了車臣的經濟、政治生活，而且還影響到了車臣人的民族性格。在俄羅斯作家、旅行者的筆下，異文化的文化審視就使得車臣文化具有了另一種意義。當實現現代化成為落後民族國家和的咒語、和走向進步的指標時，一切弱小民族的民族特性和文化價值都被邊緣化了。但是文化多元主義和後現代理論卻認同文化的差異性。那些籠罩在西方話語霸權之下的、以西方現代文明為衡量標準看來是落後的國家和民族，卻正無須由現代文明去發明和「照亮」，依舊具有無可替代的、與其他文明平等的價值。以賽亞·伯林從展示並保留了文化獨特性和多樣性這一意義上，甚至認為蘇聯的解體似乎也有積極、正面的意義：「我們能看到蘇聯的巴別塔垮成廢墟，只該感到慶倖，即便有些效果變得很險惡——我是指激烈的民族主義衝突而言」<sup>1</sup>。而曠日持久的車臣危機恰恰使得那些原本潛在的俄羅斯與車臣之間的文化差異日漸凸顯出來。隱藏在政治危機和衝突背後的，還包括那些深刻的偏見與誤解。

—

俄羅斯與車臣人早期的文化交流和碰撞，一則來自戰爭和征服，一則來自人民之間的共同的經濟文化生活。在這樣一種不對等的交流中（畢竟，俄羅斯是一個人數眾多的民族，而車臣是一個少數民族，俄語的信息量又遠遠大於車臣語），車臣人在一定程度上借助俄羅斯人的觀念和印象，被外界所認知。在俄羅斯帝國以及蘇聯的民族叢林中，車臣人只是其中不起眼的一個。長期以來，有關車臣的歷史文化都只是作為俄羅斯帝國（以及蘇聯）的一部分而被提及。

在俄羅斯境內生活的眾多民族中，俄羅斯民族歷來是領導民族，在各民族中佔據主導地位。置身於眾多的少數民族中間，俄羅斯民族對於自己國家之內的許多民族幾乎像外國人那樣，

缺乏瞭解。反過來，這些弱小的少數民族卻對於俄羅斯民族的瞭解多於俄羅斯人對自己的瞭解。正如一篇文章中所寫的那樣：「那些俄羅斯人從來沒有與高加索民族一起生活過，而只是在市場上或者在交通工具上注意過這些民族的個別代表，不僅沒有像樣的理由不喜歡作為整體的這些人，而且也不能夠判斷他們誰是誰」<sup>2</sup>，「所有人對於他們幾乎都是一張臉孔；相反，高加索人則對於判斷一個人的民族屬性卻具有一種超乎尋常、甚至是病態的能力」<sup>3</sup>，對於他們遇見的任何一個毗鄰他們的邊疆地區的人（甚至還不止是與他們相近、毗鄰的人），他們都能夠判斷出那些波蘭移民後代身上的「不太俄羅斯」的東西，他們可以「憑藉許多不易覺察的特徵，饒有興致地猜出他的民族屬性」，並且幾乎從來沒有差錯<sup>4</sup>。這種不對等的交流和反映，是以經濟、文化的差異甚至差距為前提的。長期以來，作為俄羅斯帝國（蘇聯）境內的眾多少數民族之一，車臣人向來都只是處於邊緣位置；正是車臣危機和俄羅斯-車臣武裝衝突使得車臣人從幕後走向了前臺，從邊緣走向中心。

在俄羅斯作者的筆下，車臣人的形象幾乎從來就是消極、惡劣的。在1823年出版的一本《高加索人》的書中寫道：按照禮節（我們可以理解為文明程度），車臣人可以分為三類：「和平的車臣人」、「獨立的車臣人」、和「山地的車臣人」。「和平的車臣人」，就是被武力征服的、松日河右岸的24個村莊的居民；「獨立的車臣人」，就是不友好的車臣人，有屬於自己的適於種植和放牧的肥沃土地，水和森林豐富，住在從黑山山腳到南面的地方，阿克塞河和松日河的河流沿岸；而字「獨立的車臣人」中，有一部分人是高加索的極為有名的強盜，他們被稱做「山地車臣人」。在該書作者的筆下，車臣人往往結成一些小的幫派（由5到20人組成），渡過捷列克河，潛伏著，襲擊物件是那些不加小心的旅行者或者在農田幹活的、缺乏防範的農民。如果抓到的是軍官或者是商人，那麼就將臉、手、腳都貼在牆上，監禁起來，給很少的食物，幾天之後拿來紙、筆、墨，指定贖金，並通過第三者將信送到俄羅斯。要是掠奪的是普通人，就將他在市場上賣掉<sup>5</sup>。此外，山民還是一些不講信義的人。19世紀20年代前後到過高加索的普希金曾經寫到：切爾克斯人仇視我們。他們常常潛入山中，從那裏對我們發起襲擊。和平的切爾克斯人的友誼也是靠不住的：他們永遠準備幫助自己同部落的搶劫者<sup>6</sup>。

在對車臣人的這種認識的支配下，許多俄羅斯歷史學家就認為，有關俄羅斯征服高加索的戰爭都可以歸結為「使山地民族變得文明，終止他們的強盜式的襲擊——那對於高加索的俄羅斯居民點是經常的、和重大的威脅」<sup>7</sup>。

19世紀俄羅斯著名思想家尼·雅·丹尼列夫斯基曾經對發生在自己時代的俄羅斯帝國對高加索的長達60年之久的征服戰爭作過評價和論述。尼·雅·丹尼列夫斯基基本上是為了俄羅斯帝國的擴張行動辯白的。他說，俄羅斯征服南方（高加索）並非因為想要讓俄羅斯民族居住在那裏。對於北方民族來說，居住在南方是自殺性的，西伯利亞對於俄羅斯比高加索更有吸引力。作者對高加索山民充滿了誤解和偏見，毫無好感：「就其狂熱的宗教、生活方式、習慣以及他們所居住的國家的特性來說，高加索山民是一些天生的盜賊和搶劫者，永遠不讓、也不會讓自己的鄰居安寧……」<sup>8</sup>在尼·雅·丹尼列夫斯基看來，俄羅斯的征服行動幾乎是異常高尚的行動，甚至是犧牲自己的利益惠及他人：「俄羅斯知道，她給自己加了一個沈重的包袱，儘管它也許還沒有預計到，這個包袱是如此沈重，需要為此進行為期60年的連續不斷的戰爭。無論如何，不管是實質還是形式，這都不是征服，而是對疲憊不堪者和瀕臨死亡者提供幫助。」<sup>9</sup>。

甚至十二月黨人的思想家彼斯特爾對車臣人也充滿歧視和偏見。1824年他在自己的憲法第一章就講到對待高加索山民的對策。他認為包括高加索在內的許多土地都應該歸併俄羅斯：

「因為為將山地民族變成和平和安寧的鄰居的所有嘗試，明顯地、無可爭辯地證明不可能達到這一目標。這些民族不會放過任何微不足道的機會給俄羅斯造成盡可能的危害。只有一種手段可以將他們馴服，那就是將他們完全征服。儘管這暫時不能完全做到，但是不能期待安寧，也不能期待安全，在這些國家裏永遠都會有戰爭。」<sup>10</sup>。接著，彼斯特爾寫道：「他們信仰不同的宗教，操著不同的語言，風俗習慣和管理方式極不相同，唯一相同的是都熱衷於相互之間胡作非為和攔路搶劫。」<sup>11</sup>彼斯特爾主張嚴厲、甚至是殘酷地對待這些山民。他主張將高加索民族分為兩部分：一部分為和平的，另一部分是狂暴的。將前者作為俄羅斯臣民對待，而將後者用武力遷居到俄羅斯內地，將他們分散成數目小的若干部分，散居在俄羅斯各州；同時，在高加索建立俄羅斯居民點，將不馴順的山民的土地分給這些俄羅斯居民。這些觀點與俄羅斯帝國政府後來的做法甚至不謀而合。許多俄羅斯政論家乃至普通的民眾都認為，俄羅斯對高加索的征服並非殖民行為（值得一提的是，包括以研究高加索問題而知名的歷史學家波克羅夫斯基也認為，征服高加索山民並非出於殖民目的（同山民的戰爭——高加索戰爭——直接源于遠征波斯；其戰略方面的意義甚於殖民的意義，自由的山地部落永遠威脅著俄羅斯軍隊）；而是一次將同樣信仰基督教的兄弟民族例如格魯吉亞從其野蠻卑污的山民鄰居的包圍中解救出來的正?行動，幾乎是在俄羅斯的南部邊疆進行的一次十字軍征服。此外，在俄羅斯民族歷來的彌賽亞思想的支配下，俄羅斯征服這些落後的民族或者部落，被認為是為了解放他們，為他們帶來更高的文明。而且征服高加索所帶來的經濟上、戰略上的好處，本來就是俄羅斯有權利追求的。但是高加索山民對俄羅斯帝國軍隊的頑強抵抗，和俄羅斯在高加索戰爭中付出的巨大代價，使俄羅斯人感到憤懣。

如果說，來自敵人和充滿成見或者敵意方面的觀點，是不可靠的；那麼，身為北高加索各個民族和部落的領袖，領導他們反抗俄羅斯帝國征服戰爭的沙米爾對車臣山民也素無好感。在沙米爾看來，山民們天生酗酒、打劫殺人和淫亂，：「我殺死他們並不是因為他們忠於俄羅斯人，……他們從來沒有表現出這一點。我殺死他們是由於他們卑污的天性：熱衷於偷盜和打劫。」<sup>12</sup>。他認為他統治的是一個下流的民族，搶劫犯，這些人「只有在看到頭上懸挂著已經砍掉幾顆腦袋的軍刀時才會做一些善事」<sup>13</sup>。在這一信念的支配下，沙米爾對山民採取了極為嚴酷的鎮壓措施。

然而在19世紀的俄羅斯作家的文學作品裏，車臣人乃至整個北高加索山民的形象卻與俄羅斯的思想家們卻有所不同。一方面，俄羅斯作家對包括車臣人在內的所有山民加以歌頌，另一方面仍舊描寫了山民的落後、愚昧、殘忍等陰暗的方面。在俄羅斯著名作家普希金的長詩《高加索的囚徒》中，講了一個感人至深的故事：一位切爾克斯少女愛上了一名被俘的俄羅斯軍官，這位少女不顧家族部落的規矩，將俄羅斯軍官放走，然後，切爾克斯少女投河自盡。實際上，這樣的文學作品重復了男權中心時代的主題：一個女性為了所愛的人而委曲求全，甚至犧牲自己的生命；尤其所愛者還是一個自己所屬的家族、部落或者民族的仇敵和侵略者。而在萊蒙托夫和托爾斯泰的文學作品中，則對切爾克斯人-山民大加讚美，在他們的筆下，山民或者切爾克斯人是一些驕傲的、勇敢的人，但是按照原始的、自然的方式生活。在俄羅斯作家中，普希金、萊蒙托夫、格裏鮑耶多夫、波列紮耶夫、拉多日尼茨基、費特等曾經寫作大量詩文，熱情洋溢地歌頌高加索以及山民。對於這些作家來說，他們在這些山民（被籠統地稱做切爾克斯人）的身上寄託了自己的某種人性與社會的理想，因此具有強烈的浪漫主義的和理想主義色彩。在萊蒙托夫的小說《當代英雄》中，也曾經寫到了高加索山

民，他們多半愚昧落後，不守法律，缺乏道德操守，但作者對他們的態度卻並不是完全的鄙視。小說在寫到主人公在從高加索返回的路上，僱傭的幾個山民（奧塞梯人）扛物品，山民們假意吆喝公牛前進，但是實際上卻是故意拖延時間，有意要敲竹杠討要小費。車主，深諳此道的當地人說：「糟糕透了的下流胚，這些亞洲佬！您當他們吆三喝四，是在幫忙嗎？鬼才曉得他們是在吆喝些什麼？公牛可明白他們，就算套上20頭吧，只要他們用自個的話吆喝，公牛也會寸步不移……」<sup>14</sup>在小說的另一處，又寫到：「我們那邊的卡巴爾達人或者是車臣人，雖然他們全是強盜胚，窮光蛋，但卻是能豁出性命的硬漢子。」<sup>15</sup>作家托爾斯泰在小說《哈吉穆拉特》中寫到了聞名全車臣的原沙米爾將領哈吉穆拉特因為不堪忍受沙米爾的嚴峻統治以及出於同沙米爾的個人恩怨，叛逃到俄羅斯；但是後來又逃回車臣，結果被追趕的俄羅斯軍隊打死。作者寫到：「就是這個死，使我想起那棵在犁過的田地裏被車壓倒的牛蒡花」<sup>16</sup>。而作為呼應，在小說的開頭，作者就讚美了牛蒡花，牛蒡花成為車臣民族的某種象徵：「然而生命的毅力和力量是多麼的驚人，它是如何頑強地防衛著，並且高價地犧牲了自己的生命啊」<sup>17</sup>。小說和其他藝術作品對於一個民族形象的刻畫，往往具有更加廣泛的流布範圍，影響也更大。車臣人在俄羅斯那些優秀作家的作品中，就是以這種形象而被定格了。

## 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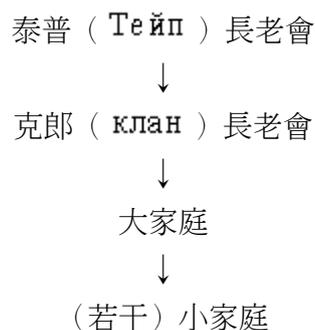
十月革命以後，1917年到1920年間，車臣人與高加索的其他民族一起，迸發出高度的政治熱情；開始了建立自己國家的運動，與布爾什維克一起，消滅了白色勢力，建立了蘇維埃國家。但是隨著蘇維埃時期採取的一系列激進的政治措施，破壞了車臣社會原來的組織和結構，而這就激起了愛好自由的車臣人的激烈反抗。在這些對抗中，車臣人被視為不安分的、難以統治的民族。1921年到1925年，車臣曾經發生了大規模的武裝起義；蘇聯政府動用了大批正規軍隊，運用轟炸、炮擊的手段，才將起義鎮壓下去<sup>18</sup>。在集體化時期，由於史達林蘇聯政府強制推行集體化，破壞了車臣人的內部生活，1929年，車臣人進行了激烈反抗，遭到嚴厲鎮壓。到了30年代的大清洗時期，車臣人也飽經苦難，許多車臣人像其他蘇聯人一樣，遭受了鎮壓和清洗。但是，車臣人在長期的歷史發展過程中，形成了一種獨特的民族性格，他們天性酷愛自由，勇敢、剽悍，不畏強暴，對於強權有本能的反抗意識。可以說，在整個蘇聯時期，車臣人遭受了許多苦難，同時也反抗不斷。而在一個時期裏，車臣人與北高加索地區的其他民族因為民族之間的競爭，一直存在著矛盾。而蘇聯政府的宣傳中也公然將車臣人視為蘇聯「各民族間友誼的障礙」，是一個最「困難」的民族。到衛國戰爭接近尾聲的時候，車臣人遭到史無前例的流放。而在隨後公佈的流放原因中則表明，車臣人是由於有投敵附逆的行為而遭到懲罰的。這樣，車臣人實際上就又成為一個全體成員都是叛徒的民族；至少在蘇聯人的心目中就是如此。因為蘇聯政府在流放車臣人的時候是不加區別的。因此，他們背負著精神上的重負，在蘇聯社會中，在流放地，飽經歧視和苦難；而這對於蘇聯社會來說似乎是理所應該的。在那個時代，通常是以一個抽象的政治標準將人民劃分為敵我兩派，很少有人能超越這一法則。

蘇聯的持不同政見者、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索爾仁尼琴曾經在自己的小說《古拉格群島》中寫到了身處流放地的車臣人。在作者的筆下，他們是一群文化落後、缺乏創造力的人。即使在流放地，各個民族之間的差異也是極其明顯的。德意志人是「最整潔、熱愛美」的，希臘人則擁有良好的道德規範，而車臣人則與外界封閉起來，他們住在名為「薩克利亞」（即俄語

Сакля) 的又矮小又破的房屋裏。在當時，車臣人是與其他被同時流放的穆斯林民族一樣，背負著出賣國家的叛徒的惡名。在這一時期，車臣人的形象就是一個全體成員在政治上有過錯的民族，車臣人為此受盡歧視。在流放地，許多民族之間的衝突都是由於對車臣人的歧視而引發的，因為蘇聯國家已經宣佈，他們是因為投敵附逆而被流放到此的；而在車臣人的北高加索故鄉，車臣人和其他被流放民族的土地和房屋被其他民族的移民合理合法地佔據了，並且得到政府默許甚至是鼓勵，因為車臣人被流放後，原來的共和國境內已經變空了。在這一時期，車臣人對於俄羅斯人、以及蘇聯的其他民族的消極、反面的形象，是由於史達林乃至蘇聯的政治體制、和錯誤的甚至是有罪的民族政策所導致的，幾乎可以說，是蘇聯政府將這樣的形象強加給這個民族的頭上。

應該說，俄羅斯人對車臣人的這種消極觀念，在很大程度上首先來自車臣人自身。畢竟，車臣這樣的民族對於現代生活、現代文明，確實是一個後來者。但是，另一方面，也在於俄羅斯帝國時期對於車臣人的長期征服和統治，以及由於這種殖民統治、和包括蘇聯時期在內的俄羅斯錯誤的民族政策所帶來的民族之間的仇視和敵意。在俄羅斯帝國對外擴張的情況下，俄羅斯民族對於被征服民族具有某種大俄羅斯主義色彩的優越感和歧視。甚至在相當多的俄羅斯人看來，俄羅斯將這麼多落後的部落和部族征服並歸併到自己的版圖，是解放了這些民族，是文明對野蠻的勝利。丹尼列夫斯基甚至為此而對歐洲指責俄羅斯發動高加索戰爭感到忿忿不平；對於丹尼列夫斯基來說，俄羅斯征服高加索地區而遭到西歐的譴責，就像是幾百年前俄羅斯抵抗了韃靼—蒙古，而在19世紀上半期打敗拿破侖法國挽救了歐洲一樣，理應得到歐洲的感激才是。

車臣社會的氏族部落的痕跡還很深刻，所以，親緣關係在車臣人社會中非常被看重。當一個車臣人在莫斯科或者其他的大城市做生意站穩腳跟，就會將一個大家族都帶來到這裏，於是就形成一個龐大的車臣人社區。外部世界對於車臣人的成見還來自車臣（在整個北高加索地區都存在）社會的獨特的社會組織和社會結構。如果用一個圖表的形式，就可以直觀地將這種分層的社會機制反映出來<sup>19</sup>。



在克郎 (клан，相當於氏族)–泰普的社會結構中，若干個小家庭（一個小家庭由大約5名到20名成員組成）組成一個大家庭，長老具有決斷權，長老的意見是決定性的，它對於所有的家庭成員都是具有法律般的效力，並凌駕於世俗法律之上。這種社會結構的特點是：嚴密，封閉，嚴酷。在這種社會中，做出的決斷以及對該決斷的執行都是高效的。亞歷山大·索爾仁尼琴的小說《古拉格群島》中就寫到，在中亞流放地，一個車臣人阿布杜爾·胡達耶夫殺死一位車臣老人，逃到監獄裏，但是他的親人將受到死者家族血親復仇的威脅；幾位車臣老人決斷，必須將殺人者當場宣判並處死，否則就處死阿布杜爾·胡達耶夫的弟弟。在這種情況下，有人給阿拉木圖發電報，將車臣民族最受尊敬的長老請來。長老們召開會議，對胡達耶夫進行詛咒，宣佈不論在地球的任何地方，「只要他遇見車臣人的刀子，那把刀就應

該把他處死」，這樣，胡達耶夫家族的人就可以隨便走動，不會被威脅了。

每一個泰普還擁有自己一定的領土：「氏族城堡」，顯示自己氏族的興盛。這種社會組織可以迅速地將屬於泰普的人們動員起來，捍衛自己的利益。泰普在車臣乃至整個北高加索地區，對該地區社會的日常生活具有重大的意義。而且在90年代以來，泰普的社會結構還日漸具有了政治功能。一個泰普往往支援一定的政治領導人或者政治派別；而反過來，一個政治領導人也多半是以某些泰普作為自己的政治基礎。在以後的歷史時期內，這些特徵並沒有消失，儘管在被納入俄羅斯帝國的經濟社會發展軌道中，原來的自然進程被打破。但是，如果說當代的車臣社會保留了氏族時代的特徵，等同於氏族部落的落後狀況，恐怕無論如何也是說不過去的。實際上，在那些宗族社會的外表之下，已經發生了多麼深刻的變化。而且宗族勢力和組織形式所具有的社會文化意義在當代和在特定的歷史時期是截然不同的，那無論如何也不再是傳統意義上的氏族部落社會的生活方式，這樣的說法還否定了車臣民族在漫長的歷史時期內——尤其是在歸併俄羅斯帝國以後——所取得的歷史進步（有人認為，在杜達耶夫上臺時，車臣的泰普體系已經被摧毀了）。但是宗族勢力和形式有如此強大的生命力，表明它仍舊在某些方面適應了車臣社會生活的某些要求，具有內在的合理性。而且落後和進步也是相對的，許多前代的事物也許就在後代以某種形式改頭換面地回復了，而這卻受到人民的認同。

獨特的自然環境和人文地理環境造就了高加索山地民族獨特的思維方式和行事方式。在衝突的情況下，山地民族更傾向於用武力的手段解決衝突：認為這樣的解決方式更可靠、有效<sup>21</sup>。這種特點體現在現實生活中就是當地所有的共和國都建立了一些軍事組織或者准軍事組織，例如車臣建立的「曼素爾」、以及曾經在阿布哈茲作戰的「高加索民族同盟」等等。幾乎各個民族都建立了自己的近衛軍。社會生活的軍事化或者准軍事化，這也是北高加索山地民族的一種特色，而車臣在這方面走得更遠（到1992年9月的時候，車臣的軍隊已經達到1萬人）。

移居他鄉的車臣人，由於他們具有亞洲人的面孔——或者就是高加索人的面孔，又在當地形成一定規模和勢力，並且與外界隔絕，很少往來，因而就被看作一個神秘的外來世界。而當經濟不景氣的時候，他們就被視為殘酷的競爭者，對當地人造成經濟上的威脅。正如有人指出的那樣，在重大的歷史轉折時期，少數民族的代表就會變得顯眼。當經濟、政治形勢很好的情況下，也許沒有人會留意到這些，但是當經濟不景氣的時候，社會心理就會變得不寬容，少數民族、尤其是在經濟上取得某種成功的少數民族，往往就會成為多數民族（主民族）的歧視的犧牲品。實際上，在一定的時期內，高加索人在俄羅斯大城市的經濟上的成功，其地位卻往往類似於猶太人，即經濟地位高於政治地位，因此尤其容易遭到嫉恨。甚至還有這樣的一種微妙的心理定勢：當一個人被出身俄羅斯族的匪徒勒索，往往就會視為正常，而如果是被少數民族的匪徒勒索，其反應就會極端消極。在蘇聯解體之後的很長的時期裏，俄語的辭彙中出現了一個特別活躍的、有生命力的辭彙：那就是「高加索民族臉孔」（**ЛИЦО КАВКАЗСКОЙ НАЦИОНАЛЬНОСТИ**），這是一個具有強烈的歧視意味的辭彙。它是動蕩不安的當代俄羅斯社會的苦悶象徵，並且是與那些「野蠻資本主義」、投機、恐怖主義等社會現象緊密聯繫在一起的。在經濟蕭條、社會動蕩的時代，俄羅斯的社會心理發生了多麼陰暗而可怕的變異和扭曲，人們已經失去判斷是非曲直的能力。

20世紀90年代以來，在車臣人乃至北高加索人的形象惡化甚至醜化方面，部分俄羅斯媒體起了極大的消極作用。一些不負責任的報紙，慣於採用新聞手法，或者誇大其辭，或者聳人聽聞，或者資訊不實，攻其一點、不及其餘；等等。但是，恰恰是這樣的新聞報道卻是最受歡迎的，在某種程度上也是影響最大的。許多大大小小的犯罪案件，作者往往要特意強調一下犯罪嫌疑人的高加索出身。尤其在俄羅斯軍隊對車臣開展軍事行動以後，報紙上連篇累牘的報道都是關於車臣人如何清洗俄羅斯居民、綁架和殺害人質和平居民的，幾乎是一種反車臣的歇斯底里。於是在普通的俄羅斯人的眼中，車臣人是一個「犯罪的民族」。隨著俄羅斯與車臣的衝突逐漸發展，俄羅斯人對車臣人（以及車臣人對俄羅斯人）越來越懷有敵意和仇視，連俄羅斯的政治家在談到車臣問題時也缺乏必要的理智。在車臣戰爭前後，車臣和俄羅斯都利用電臺，電視臺，網站等工具，展開了激烈的「資訊戰」或者說「宣傳戰」，以便為自己爭取輿論同情和支援。俄羅斯傾向於將車臣反抗者塑造成為一個恐怖主義集團，而俄羅斯軍隊的軍事行動則是為了在車臣乃至俄羅斯恢復憲法和法律秩序的合法的警察行動；另一方面，車臣也盡力將俄羅斯刻畫成為兇惡的敵人。車臣人力圖將車臣的反抗活動表現為擺脫俄羅斯對車臣長期以來的殖民統治，是爭取民族自決的正義行動。雙方都盡力表現對方在武裝衝突中的殘忍和野蠻的方面，每一方都決不放棄給對方造成被國內和國際輿論譴責的機會：「……雙方都盡量詆毀對方，常常把對方形容成為非人的惡魔。葉利欽在談到車臣遊擊隊時說：瘋狗必須處死」<sup>22</sup>。但是有關的民意測驗表明，對車臣人持有消極觀念的俄羅斯人，他們中間的大部分人竟然都沒有和車臣人接觸過<sup>23</sup>；媒體是如此神奇地左右著人們的觀念。

不同的文明具有相同的價值。對於不同的文明，我們承認差別，但是我們不能做價值判斷說，一種文明是有價值的，而另一種文明則是沒有價值的；或者說，一種文明的價值高於另一種文明。

按照加拿大著名哲學家查爾斯·泰勒的觀點，承認對於人們是一種極為重要的需要。對一個群體的承認和該群體對自身的認同是不同的，對一個民族的正當的承認也是正當的需要，同時，一個民族或者群體的認同很大程度上也是由別人的承認決定的。如果別人的承認是扭曲的，就會對這個民族或群體造成傷害。扭曲的承認所造成的嚴重後果，是使受害者造成「創傷和背負著致命的自我仇恨」<sup>24</sup>。實際上，對於承認的需要，也正是民族主義運動的驅動力之一。對於車臣人在俄羅斯民族以及其他民族觀念中的反映，表現出了對車臣民族的歷史形成的誤解和偏見。任何民族當然都會具有這樣那樣的種種特點，表現出某種構成民族性的東西。在今天的車臣，一些車臣人從事掠奪、販賣人口的罪惡貿易和活動——這決非正派人所為。但是不應該只將問題的某一方面無限誇大，或者簡單片面，而由於偏執和狂熱失去公正和客觀；而且，對於一個民族在特定的歷史時期的某些活動和特點，也要表示同情的理解。阿克頓勳爵曾經說過：歷史是形成民族性格的最強有力的因素之一，車臣人的民族性格也與其歷史是分不開的。作為游牧民族，車臣人並沒有表現出與其他處於相同歷史發展階段的游牧民族更多的差別。在許多有記載的游牧民族的歷史上，比如法蘭克人、貝杜因人等，都以偷盜、掠奪為榮，不事生產，這是由於其生存方式決定的。在車臣的社會裏（甚至在那些最遠離現代文明的原始部落裏），也有自己的道德規範，善惡標準，用我們社會的道德規範去衡量他們是沒有意義的。遺傳學的成就並不能為一個民族的道德狀況提供學理上的支援。正如查爾斯·泰勒所說：「從人類歷史的角度看，任何關於先天的文化差異都是站不住腳的」<sup>25</sup>。至於說部分車臣人在二戰期間的投敵附逆行為，則這只是表明特定環境下少數車臣人的政治態度，並不能表示車臣人天性不講信義、容易變節，一個民族的個別代表的行動並

不足以讓這個民族全體都必須為他們背負惡名。著名的高加索問題專家波克羅夫斯基針對沙皇政府的史學家所謂的高加索山民熱衷於「搶劫」和「襲擊」的說法，指出：「應該記住，高加索戰爭在很大程度上是遊擊戰爭，真正發生的這樣的襲擊（有不少幾乎是杜撰出來的）也是遊擊行動，那些山地封建主所採用的，其性質非常接近西歐中世紀的男爵的襲擊活動，只是一些例外」，此外，波克羅夫斯基還指出：沙皇軍隊也幹過襲擊的活動，特別是那些居住在防線上的哥薩克<sup>26</sup>。那麼，我們必須指出的是：今天，當全世界都從新聞媒體得知車臣人從事綁架人質、勒索財物的活動時，實際上，俄羅斯聯邦軍隊的這種行為也不少見。俄羅斯著名的《新報》記者安娜·波利特科夫斯卡雅就曾經報道了俄羅斯士兵在車臣設置「過渡營」，拷索人質等行徑。雙方的這些行為表明了車臣與俄羅斯對抗的殘酷、和民族矛盾的深刻。

車臣民族並沒有表現出比其他民族更少的才華和創造力。有許多出身車臣民族的大學者、商人、軍事指揮官等，他們都是車臣民族的優秀代表。俄羅斯作家、思想家托爾斯泰曾經親自參加過高加索戰爭，在他的小說《哈吉穆拉特》中就表明了這樣一個主題。小說中，俄羅斯士兵被迫打死車臣人，同時還侮辱了他們的聖地，而反過來車臣人也蔑視和仇視俄羅斯人。最後，俄羅斯士兵在說到那些被他打死的車臣人的時候，說：他們都是些多麼好的孩子！完全像俄羅斯人一樣！在衛國戰爭中，有18000名車臣人參加了衛國戰爭，勇敢作戰，建立功勳。然而可悲的是，蘇聯政府卻有意抹殺這一點。衛國戰爭中的蘇聯英雄巴依布拉托夫被登記為庫梅克人，馬哈麥德-米爾佐耶夫被登記為塔吉克人，而努拉基洛夫則竟然被同時登記為庫梅克人和韃靼人<sup>27</sup>。車臣追求獨立運動的民族主義領袖喬哈爾·杜達耶夫的出身俄羅斯族的遺孀阿拉·杜達耶娃接受記者採訪的時候，竟然對車臣民族說了那麼多的溢美之辭：她認為在車臣境內發生的殺害三名英國人的事件絕非車臣人所為，而是俄羅斯特工的陰謀；是為了嚇唬外國的投資者，並向外界表明車臣人是怎樣的野蠻和殘忍，是匪徒和恐怖分子。在說到車臣民族的時候，她認為，車臣人是一個極為知恩圖報的民族，很容易忘記受過的傷害和屈辱；他們只是在復仇的時候才記得敵人，而且也不會背後放冷槍。至於那些在莫斯科發生的爆炸事件，杜達耶娃認為也不可能是車臣人幹的，因為這是車臣民族傳統和復仇戒律所不允許的<sup>28</sup>。

由此可見，民族之間的理解與交往是多麼不易。一個民族與另一個民族在交流、交往乃至相處的時候，必然存在某種文化、心理上的差異，但是，如果在一個國家中還有另一個地區與該國家的政治社會體制、經濟生活都存在很大差別，在一個社會中還有另一個社會時，這種文化差別就具有了政治學上的意義。應該說，文化發展與政治社會的發展進程存在某種脫節之處。在一個統一國家中的少數民族，往往想要保持文化特性和獨立性，是趨於保守的；而對於統一的國家來說，則傾向於將社會中的各個族群的特色泯滅、趨同，使社會成為一個同質的社會。在一個社會中，民族之間如果存在嚴重的文化差異、文化隔閡，再加上經濟、政治利益的差別，那麼這樣的社會就會有更多的可能走向衝突<sup>29</sup>。而對於俄羅斯來說，即使在軍事上取得成功，但是對於如何在車臣地區恢復中央政府的控制，恢復法律和秩序，仍舊是極其困難的；因為要在那裏長久地恢復安寧，讓車臣人實現與整個俄羅斯國家和社會的一體化才是根本出路。

但是，個別車臣武裝在與俄羅斯軍隊的對抗中進行諸如綁架、掠賣人口、毒品貿易等活動，就使得車臣民族全體都蒙受了恐怖分子的惡名。2001年9月11日發生在美國的恐怖事件，使得美國改變了對俄羅斯在車臣軍事行動的態度，從而就更加凸顯了車臣人政治活動的非法性。當俄羅斯境內某處發生了恐怖爆炸事件，立即就會聯想到車臣人，車臣人幾乎成為「恐怖分

子」的代名詞。在這種情況下，俄羅斯軍隊對於車臣的報復也就越加殘酷（有資料表明，俄羅斯軍隊在車臣也採取了一些針鋒相對的措施：如掠奪人質，勒索贖金等等）。車臣人愛好自由、剽悍善戰、不慣於屈從，但是車臣民族又是一個弱小的民族，而這樣情況下車臣民族往往苦難更加深重，在與強大的俄羅斯的武裝衝突中，付出的民族犧牲也就越大。車臣民族性格中的一些特點，在很大程度上也是車臣人蒙受苦難的原因之一。

查爾斯·泰勒指出，在父權制社會，女性被迫接受她們自身卑賤低下的形象，久而久之就將這種形象內化，以至「當阻礙她們前進的客觀障礙已經消失了以後，她們仍舊無法利用新的發展機遇」<sup>30</sup>。黑人的處境也與此相似：白人社會為黑人設計了貶損黑人的形象，黑人只能接受而無力拒絕，從而黑人的自我貶抑就成為對其進行壓迫的最好手段。同樣，在俄羅斯在車臣民族的關係中，俄羅斯可以為車臣人設計一種民族形象，將這一形象強加於車臣人。對一個人或者一個群體的扭曲的承認，也會使其自覺不自覺地接受這一形象；尤其當承認者對於被承認者具有文化上的強勢的時候就更是如此。當一個人，如果周圍所有人都認為他是不可救藥的，那麼這個人也就真的會自暴自棄，一個群體也是如此。比如，說車臣人是剽悍善戰的，而車臣人也就真的認為自己的民族性格中具有這一特殊的能力。據說，在約旦有5000多車臣人，他們中許多人主要是擔當約旦王室的保衛任務<sup>31</sup>。而如果將這一邏輯推演開來，如果俄羅斯乃至全世界的媒體都認為或者傾向於將車臣人塑造成為可怕的恐怖主義者，那麼，也許許多車臣人世世代代就真的成為恐怖分子。種種因素決定了：現在和將來，俄羅斯都必定在車臣擔負著沈重的反恐任務。在車臣，具備滋生恐怖主義的一切必要條件：惡劣的社會經濟形勢（在車臣戰爭中，許多車臣人之所以拿起武器成為戰士，是出於生計，因為統計表明，車臣的失業率高達90%以上，而做雇傭軍可以得到固定的收入。當車臣戰爭結束後，車臣的經濟實際上已經被完全摧毀）；許多人因為戰爭而罹患「車臣戰爭綜合症」（長期生活在戰爭的條件下，有親人在戰爭中死去，幾乎每一個車臣人都有心理疾病）；大量車臣青少年沒有機會接受教育或不願意接受教育（這是車臣社會不穩定因素之一）；大量的武器流入車臣境內；等等。而在所有這些因素以外，更嚴重的還在於嚴酷的社會心理氛圍（尤其是第二次車臣戰爭期間，車臣境內成為戰場，而當車臣人離開車臣進入俄羅斯其他地區時，往往被視為恐怖分子的嫌疑人，受到嚴格的監視和盤查）。1944年對車臣人的全體流放，至今仍舊是車臣民族集體記憶中的巨大創痛——它戕害了車臣人的民族尊嚴，使車臣人遭受了巨大的苦難。而以後，車臣人在教育自己的後代的時候，可以在高加索戰爭、強制集體化、1944年流放之後，再加上20世紀末的車臣戰爭，這些將教會已出生和未出生的車臣人以仇恨。俄羅斯政府在車臣的失敗就在於：它使得本應是俄羅斯政府對車臣分裂活動領導人的討伐變成了俄羅斯政府與車臣人的矛盾、甚至是俄羅斯民族與車臣民族的矛盾甚至是致命的仇恨（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之後，德國很快就走上了準備和發動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道路。社會學研究告訴我們：那些陰暗的心理氛圍，那些屈辱和仇恨在其間曾經起到了多麼巨大的作用）。俄羅斯政府應該給予這些弱勢群體以更多的扶持和幫助，而不要再人為地增加本來就存在的隔閡。對於消滅與俄羅斯正面對抗的車臣武裝來說，俄羅斯的軍事力量是足夠強大的（可以說，現在俄羅斯已經達到這一目標）；但是，當車臣危機的軍事階段結束後，軍事手段已經不再重要，應該做的是幫助車臣實現社會和文化發展，消除那些導致恐怖主義的根源。否則，在未來，車臣的危機不難再起，而所謂「俄羅斯與車臣的矛盾是永恆的」的命題也許並非神話。

## 註釋

- 1 劉軍甯主編：《直接民主與間接民主》（北京：三聯書店，1998），頁212。
- 2、3 電子出版物：М.Глобачев，《Заложник свободы》，見www.yandex.ru
- 4、5 電子出版物：Лидия Сычева，《Неизвестный народ》，見www.yandex.ru
- 6、10、11 Яков Гордин，《Кавказ：земля и кровь》（聖彼得堡，2000），頁27、8、8。
- 7、26 Н.И.Покровский，《Кавказские войны и имамаг Шамиля》（莫斯科，2000），頁29、29。
- 8、9 Н.Данилевский，《Россия и Европа》（聖彼得堡，1995），頁31、36。
- 12、13 Д.И.Олейников，《Шамиль》，《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1996年5、6期合刊，頁69、69。
- 14、15 殷涵譯註：《萊蒙托夫詩文選》（北京：商務印書館，1983），頁375、381。
- 16、17 托爾斯泰（Leo Tolstoy）著，劉遼逸譯：《哈吉穆拉特》（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頁184、2。
- 18 鄭異凡譯：〈關於1925年車臣事件的檔案〉，《世界歷史》，2000年3期，頁111。
- 19 П.В.Чернов，《Этногео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база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莫斯科，1999），頁125。
- 20 索爾仁尼琴（Aleksandr I. Solzhenitsyn）著，田大畏譯：《古拉格群島》中冊（北京：群眾出版社，1996），頁475。
- 21 Л.М.Дробижева，《Конфликтные этносы и этносные конфликты》（莫斯科，1994），頁136。
- 22 亨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著，周琪等譯：《文明的衝突與世界秩序的重建》（北京：新華出版社，1998），頁308。
- 23 А.Искандарян，《Чеченский кризис：провал российской политики на кавказе》（莫斯科，1995），頁10。
- 24、30 汪暉主編，萬俊人等譯：《文化與公共性》（北京：三聯書店，1998），頁290、291。
- 25 泰勒（Charles Taylor）著，韓震等譯：《自我的根源：現代認同的形成》（南京：譯林出版社，2002），頁9。
- 27 Светлана Алиева，《Так это было. Репрессия народов в СССР 1919-1952гг》，第2卷（莫斯科，1993），頁172。
- 28 電子出版物：《Аллах Дудаева пишет книгу о своем муже》，見www.netcity.ru /2001.8.21
- 29 多伊奇（Karl W. Deutsch）著，周?朋等譯：《國際關係分析》（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1992），頁245。
- 31 電子出版物：《Хрен с горы》，見warwebl.chat.ru/warone1.htm。

© 香港中文大學

本文於《二十一世紀》網絡版第二十一期（2003年12月31日）首發，如欲轉載、翻譯或收輯本文文字或圖片，必須聯絡作者獲得許可。